

● 文学研究

冯内古特小说中的“再成长”主题探究^{* 1}

徐文培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在冯内古特的4部小说中,主人公在经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生变故之后,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发生巨大变化,他们进入成年期后对世界的认识被颠覆,人生轨迹被改变。这些主人公的“再成长”经历,揭示出20世纪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

关键词: 成长小说;再成长;冯内古特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6-0138-6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6.032

An Exploration of the Re-initiation Theme in Vonnegut's Novels

Xu Wen-p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In four Vonnegut's novels, the protagonists have greatly changed their outlooks on life and values after they have gone through some historic events and misfortunes in life.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upon growing into maturity from teenagehood has been overthrown and their course of life has been alter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rotagonists' re-initiation expose many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the two world war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novel of initiation; re-initiation; Vonnegut

成长小说(novel of initiation)也称启蒙小说,诞生于18世纪70年代的德国,然后从欧洲传入美国。这类小说的主人公通常是从幼年或少年长到成年的男性。他们在经历某些重大事件之后,对人生具有新的、不同的感悟,对人类社会认识从无知达到成熟甚至世故的程度;他们的思想和性格经历一系列的考验,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得到锻炼,凭借对人生的感悟和顿悟逐渐走出精神危机的主人公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观、价值观也步入成熟期。(丁坤敏 郭红 2016: 166) 美国成长小说主要表现为主人公对生活意义的寻求、对诸如战争等重大事件的认识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等。《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主人公哈克在与黑奴吉姆沿密西西比河逃亡的过程中,目睹美国成人世界的残忍、虚伪和欺诈的本质,利用自己的智慧一次次机智地战胜挑战。按照成人小说的“标

准”,哈克对人和本质认识已成熟,他认清文明社会的真实面目,意识到自己“将被萨利姨妈收养并教我文明规矩,但我忍受不了,因为我先前已经领教一回了”(Twain 1981: 281) 哈克决定放弃白人世界的文明和成人世界的虚伪,在“别人之前先走一步到‘领地’去”。《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霍尔顿与哈克的成长经历相似,都“不愿意失去童真,拒绝进入成人世界”(芮渝萍 刘春慧 2015: 2)。《马丁·伊登》中,主人公马丁经过艰苦的个人努力,成为一名成功作家而步入上层社会,却发现这里的人不像自己原来想象得那样“纯洁和高贵”。他看穿只注重名望和财富的资产阶级的虚伪本性,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也随之破灭。马丁成长的主要标志是他对世态炎凉的上层社会的失望,从而导致他最终选择跳海自杀,以极端的方式拒绝苟活在这个将他原本美好梦想彻底击碎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成长小说通常以主人公从幼年或青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冯内古特后现代小说文本开放性和延异性研究”(11YJA752025)和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冯内古特后现代小说文本开放性和延异性研究”(11D038)的阶段性成果。

年步入成年期结束,其成熟的标志是初步了解、认识人和社会。然而,一个人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不可能停留至此,初入成年期的认识和“成熟”的价值观、人生观会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以及所处环境和自身地位与身份等外部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成长小说关注的成长是阶段性的,人在步入成年期之后还需要“再成长”。如果说《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马丁·伊登》这3部成长小说关注主人公从青少年到成年阶段的成长,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自动钢琴》、《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五号屠场》和《打闹剧或曰不再孤独》等小说中,则把焦点放在主人公进入成年期之后,着重探寻他们在经历重大事件和人生变故之后,在心灵和思想深处,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小说也是“成长小说”,是关于成年人的“再成长”小说。

二

《自动钢琴》的再成长主题主要体现在主人公保罗身上,具体包括他对高科技和自动化的反对、对平民阶层和普通生活的向往以及放弃工业文明、回归农业文明的决心。在小说中,由科技高度发展带来的工业化、机械化和自动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化,机器和社会制度异化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的手工劳动贬值,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日常的脑力劳动贬值……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机器使得人的思维贬值。”(Vonnegut 1980: 14-15)小说的背景是未来人类的美国城市伊利姆。该城市分为3部分:东北面是工厂区,西北面是由工厂的管理者、工程师、公务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的“精英社会”住宅区;在南面,穿过易洛魁河,住着被工厂里的机器和技术替代的“被弃者社会”(homestead)里的普通人。表面上是穿越城市的一条河把伊利姆市分成两个部分,而实际上是以科学技术和学历层次为标准,将生活在这里的人分成两个层次,将一个城市分为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精英社会”是科技社会的代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具有博士学位,包括伊利姆工厂经理保罗·普罗特斯博士的秘书凯瑟琳·芬奇,“伊利姆工厂唯一的女性,一个实际上对工作没有什么真正帮助的象征性的职位……战争期间,经理和工程师们发现,大部分秘书工作和低层次工作由机器来做会更加快速、高效和低廉”(同上:2)。如果不是象征性地雇用一名女性,以免被指责有性别歧视,凯瑟琳也许不可能在这样一个男人主宰的由技术和机器主导的世界中谋得一个职位。“保罗确信,13年前他与芬纳蒂和谢泼德来伊利姆工厂工作时,他们的成熟度远远大于自信,当然也没有认为自己属于精英阶层的气息。”(同上:6)显然,13年前自认为很成熟的保罗刚刚步入社会,完成成长小说中的“成长”阶段,带着自以为已经成熟的自信步入成人社会,经过13年的努力,在35岁时成为伊利姆工

厂的经理,跻身于代表高科技和社会主流的“精英社会”。位于这个“精英社会”顶层的是东部大区的行政官克罗纳以及该区的总工程师贝尔,年逾50岁的两人在行政管理和技术策划方面具有最高的权威。两人在企业精神和对科学发展的理解上不断为保罗等未来的“接班人”洗脑:“我们的任务是在行进中的文明队伍的前头打开一扇崭新的大门。这才是工程师和经理们要做的,没有比这更崇高的职业了”(同上:128)。虽然保罗和他的副主管谢泼德是伊利姆工厂资历和年龄最高的管理者,刚刚毕业来到工厂接受培训的大学生“热情洋溢地带着奉承的目光与保罗和安妮塔打招呼”(同上:42),保罗面对克罗纳时还是有种“驯服的、忠诚的和孩子般的感受”。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企业的管理层级体系赋予位于高层的克罗纳对自己的下属保罗具有绝对的使用权。处于权力高层的克罗纳等人组织的“梅多岛聚会”历时14天,参加聚会的经理们分成4队,在队长的带领下进行歌唱、行军、排球和飞靶射击等比赛,旨在考验像保罗这样的企业中坚力量是否能够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多项竞赛中胜出。“谢泼德说他看到梅多岛聚会见证各队队长们如何通过带领自己的队完成竞赛,来使自己的职业生涯要么得到发展,要么被中途废止”(同上:170)。

对于易洛魁河南面“被弃者社会”中的“精神灾难、革命的威胁和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噩梦般的等级制度”(同上:130),保罗产生无形的担忧,对以进步的名义而进行的发展带给普通人的害处深感不安。在某种意义上,“再成长”后的保罗打算扮演一个“导师”的角色,他要“巧妙地对安妮塔进行再教育,让她接受新一套价值观,然后退出精英社会。否则的话成为一个无名小卒的老婆给她的打击会导致悲剧事件,因为丈夫的等级成为她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基础。一旦保罗失去自己的等级,安妮塔极有可能完全失去与外界的联系,或者更糟的是,离开保罗”(同上:135)。保罗不仅开始质疑以克罗纳为代表、以高科技为标志的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开始同情大众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丧失。他要带头颠覆整个社会有史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价值观,重新恢复内心深处被压抑很久的对大自然的向往和对自由、独立生活的追求:“在外表上,他作为经理没有什么变化;但在心里,他嘲讽那些认真对待工作的人,认为他们的灵魂不自由,没有自己的强大。他从来不是一个读书人,但现在开始喜欢读书,关于那些亲近自然、过着精神充沛生活的人,那些凭借基本的技能和体力生活的人——伐木工、水手和牧牛人……不过,这些故事有一个基本的真理,有一个他渴望的原始的理想。他不想与社会打交道,他只想与上帝给人类创造的地球打交道”(同上:137)。

保罗代表工业文明和精英阶层的反叛者,他要放弃接近75万美元的身价和晋升到匹茨堡更高职位的机会,

隐退到农庄里过一个农夫的生活。他意欲逃离将他抛弃的“精英社会”,回归被机器淘汰的“被弃者社会”,却发现自己不被任何一方理解和接受。他想彻底放弃工业文明,回归到代表着农业文明的农庄,与妻子安妮塔过上在他看来世外桃源般的田园生活,却遭到妻子的强烈反对,因为她不想放弃由高科技和自动化带来的舒适的物质生活,但这完全不是保罗心目中理想的未来生活“我们将用木头点火、烧水、做饭和取暖……”(同上:336)。保罗和“鬼衫党”主要人物意欲摧毁以机器为代表的整个自动化社会,使人类社会退回到农耕时代,却发现他们的生活其实离不开像污水处理厂中的净化水机和“橙汁饮料机”这样的机器,他们深恶痛绝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也不是一无是处。“读书将取代看电视,文艺复兴将来到纽约州北部,我们将重新发现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奇观——人类的大脑和双手。”(同上:336)这场革命的发起者认识到机器对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价值的负面影响,想以革命的手段改变现状,恢复人的双手和大脑原本的功能和价值。保罗意识到,对于诺伊曼——发动这场革命的“鬼衫党”的其他主要组织者来说,“发动一场革命的目的是一次令人着迷的试验”(同上:340)。这场革命的另一个主要煽动者拉舍对这次革命感到满意:“作为一个一生都进行象征物交易的商人来说,他发动这场革命是把它看成一个象征物。而现在他欢迎作为象征物的革命走向死亡的机会”(同上:340)。这场闹剧式的革命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镇压下很快以失败告终,诺伊曼和拉舍这样的革命者达到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对于像保罗那样期待着通过革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革命者来说,这场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想要推翻旧世界,打碎所有替代他们的机器和工厂,彻底颠覆剥夺普通人存在价值的由精英阶层统治的社会制度,这样艰巨的使命无法由保罗和芬纳蒂等只有革命理想而没有明确革命思想和计划的人来完成。伊利姆的百姓倒是“渴望重建和过去同样的噩梦般的世界”(同上:340)。倒不是他们还希望像过去那样受机器的替代,受科技和精英们的排挤,而是想要恢复工业文明之前自身的劳动和技能被认可的时代“这个人(很早以前用他帽子防汗带帮助保罗修好汽车的人)那时极度不开心,而现在他骄傲地微笑着,因为他的双手在忙着做最喜欢做的事情”(同上:338)。在人和机器、人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保罗有自己的认识“机器、组织以及对效率的追求剥夺美国人的自由和幸福”(同上:314)。在保罗看来,“人类的主要事业是好好做人,而不是成为机器、机构和体制的附属品”(同上:315)。在与妻子谈论社会精英和普通人的关系时,保罗认为,“为了得到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一切,安妮塔,我们实际上出卖过对于这些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构建自尊的那种被需要和感到自己有用的感觉……当我看到我们有什么而这些普

通人有什么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狗屎”(同上:175)。保罗认识到,正是所谓的社会精英,那些不断开发新技术,用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推动自动化的工程师和经理们,才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机器取代,工业文明夺去他们做人的基本价值感。所以保罗同安妮塔在争论“被弃者”时,安妮塔认为“他们在我看来都吃得很好”(同上:176)。尽管那些被机器取代的“被弃者”因为由政府供养而衣食无忧,但安妮塔无法理解一个人除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外,还有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保罗清醒地意识到“我父亲、克罗纳、贝尔、谢泼德和我们这样的人把他们精神世界弄成空壳”(同上:176)。两个人争论的焦点是谁应该对保罗所说的工业文明造成的“混乱”负责,安妮塔马上想到“我们还有可能把他们没有得到的别的什么东西给他们”,而保罗的几句话则反映出他对这个社会问题的独到理解:“就这个问题!你把我的观点说出来了。你说我们还能给他们什么,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我们要么给出去,要么留给自己”(同上:184)。

保罗认识到,机器承担工厂里的生产任务之后,劳动者过去赖以生存和引以为豪的技能被机器复制,机器能以更高的效率和精确度生产出低成本但高质量的产品。就像小说提到的“自动钢琴”一样,人们可以用科技手段将钢琴家的弹奏录制到卷轴上,然后用一架像播放器一样的“自动钢琴”播放卷轴,这样就可以用机器将钢琴家优美的钢琴音乐丝毫不差地再现出来。“自动钢琴”代替钢琴师,机器取代劳动者,弹奏钢琴的技能和劳动者的手艺被机器复制后反复利用,钢琴师和劳动者因此失去被需要的价值,由此失去被尊重的感觉,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自然无从谈起。处于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后现代人类是该认真思考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看清文明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到底应该发展一种怎样的关系。(徐文培 2012: 142)安妮塔心中的人只具有自然属性,只需要满足吃、穿、住这样的生理需求;保罗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认识到人如果无法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失去价值感,就会失去生活的意义、方向和目标,就会发动暴乱和革命,推翻压迫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府组织,社会就会动乱,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就会停滞和倒退。

保罗·普罗特斯博士的父亲乔治·普罗特斯身居美国全国工业、商业、交通、食品和资源局局长要职,职位几乎和美国总统一样重要,而保罗在一般人眼里也可谓功成名就。他在35岁时已经当上伊利姆工厂的经理,成为伊利姆最重要,同时也是光环最亮的人。可以想象,保罗受父亲的影响,在传统的价值观的影响下,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博士学位后跻身美国社会的精英行列,而且可能有朝一日升职到父亲的高位。按照常理,他已经达到马

斯洛需求理论中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应该倍加珍惜已经取得的成功和地位,并继续朝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可以说,保罗在心理和事业上都达到“成熟期”,绝大多数像他这样的社会精英会保持稳定不变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继续追求既定的目标和价值。相反,保罗进入成年期之后经历的一切使他开始厌倦由科技发展带来的工业化和自动化,反感机器剥夺人的价值,反对机器取代人的手工劳动和技能。显然,科学技术、工业化和自动化的过快发展暴露出来的问题使保罗看穿工业文明的本质,意识到人类对工业化和自动化的依赖与无理性、无度的追求将导致机器最终控制和取代人类,导致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地位的丧失。

“那时我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当时正好是二战之后。我看见一个铣床在喷气式发动机上,也就是燃气涡轮,切割转子。对于一个机械工来说,切割一个布朗库西形状,可是很费钱的活儿,所以他们让人造了一个电脑驱动的铣床来切割叶片,我对此很着迷。那时是1949年,操作铣床的工人们预测所有种类的机器都将由小盒子和打孔卡来控制运转。由小盒子来运转所有机器,其隐含的意思的反应写进《自动钢琴》这本书中。由小盒子来做这件事的想法有意义,有非凡的意义。由一个发出咔嚓声的小盒子做出所有的决定,这本身不是什么邪恶的事情,但对于那些从工作中获得尊严的人来说太糟了。”(Allen 1988: 93)

小说中不止保罗一个人厌倦当一名工程师或经理,伊萨卡工厂的埃德蒙·哈里森也计划关掉自己负责的那部分工厂,然后“去一个岛上,住进一个北部树林中的小屋,大沼泽地里的一个小棚子里”。当别人认为机器和人不一样,因为机器不痛苦,所以它们不在意多干活时,他对机器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机器是奴隶”。“机器和人竞争……同奴隶竞争的人也成了奴隶。”(Vonnegut 1980: 280-281)小说中保罗被开除后在家里边洗衣服边看电视,节目中一个中年妇女的未成年儿子抱怨自己的智商只有59,他父亲和母亲的智商也只有53和47,而加森博士的智商高达169,她说出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儿子,你看到他的眼袋了吗?你看到他脸上的皱纹了吗?吉米,他肩上扛着世界,那就是高智商给他带来的”(同上:261)。当儿子吉米说加森博士看上去很老时,母亲告诉儿子,其实加森博士比他父亲小10岁,但吉米的父亲却“活泼开朗,面色桃红,健康状况一流”(同上:261)。

三

《自动钢琴》中的保罗进入成年期后,科技的发展、工业化和自动化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修正甚至改变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保罗成年之后的再成长是对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的揭露,是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向善的人的良知同一群人的较量,一群没有觉醒的、已经被虚假的价

值观完全洗脑的所谓的社会精英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傀儡。和保罗相比,《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的主人公埃利奥特·罗斯瓦特进入成年期后的再成长也和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有直接关系。由于发展需要攫取更多的资源,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导致美国卷入二战,埃利奥特在德国战场上误杀3名德国消防队员,用手榴弹炸死其中的两名老人,用刺刀挑死一个不超过14岁的青少年。战争的罪恶感始终伴随着埃利奥特,使他认识到战争的杀戮本质,促使他战后采取多种手段为自己赎罪。“像《黑夜母亲》中身陷身份危机的主人公坎贝尔在茫茫黑夜中寻找自己的身份一样,埃利奥特也在充满贪欲的社会里找寻着生活的意义以及他存在的价值。”(郭红 2015: 150)他37岁时成为祖上传下来的罗斯瓦特基金的继承人,用家族积累下来的金钱成立消防队,在1947年到1953年的6年间共捐出1400万美元用于各种慈善事业:防治癌症和精神疾病,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支持大学教授追求真理等。他对先辈靠战争致富的做法感到耻辱,对财富的理解、态度和处理方式远远超出先辈们的期望和同代人的理解。身居参议员高位的父亲认为他有精神病,利欲熏心的律师姆沙利为攫取基金会的巨额财富,绞尽脑汁地算计埃利奥特,动用一切法律手段来证明:已经47岁的埃利奥特因罹患精神疾病而没有资格成为该家族基金的合法继承人。整个罗斯瓦特县有57位母亲宣称埃利奥特是她们的孩子的父亲,目的也是继承基金会的财产。埃利奥特热心公益事业和救济全县穷人的普度众生的做法与社会中其他人的贪婪、狡诈和虚伪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战争的残酷杀戮本性、人类普遍存在的无法满足的物欲,外加社会对人的不良影响,促使埃利奥特向着相反的方向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一种向着相反方向的再成长。这种再成长首先是社会现实和人生经历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外部因素和事件作用于人内心深处的感知世界和理性判断的结果。

在小说结束时,冯内古特的代言人、科幻作家特鲁特对埃利奥特的行为做出公正和肯定的评判:“……如果一个人能够长时间给予别人爱,也许别人也能这样做。这意味着,我们对无用之人的仇恨和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别人施加痛苦不必成为人的部分本性。多亏埃利奥特的榜样行为,成千上万的人可能因此学会去爱、去帮助他们看到需要帮助的任何人”(Vonnegut 2006: 269)。

冯内古特之所以选择特鲁特之口来评价埃利奥特的行为,主要是因为特鲁特是作家本人的代言人(persona),冯内古特想从他的角度传达自己作为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徐文培 2014: 143):不只埃利奥特这样的少数人意识到社会和人的贪婪本性,在多数人中,利益的占有者选择维系和保卫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愚钝

的大众要么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工业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牺牲品,要么没有力量在强有力的领导者的带领下反抗统治者和上层社会对自己的压制和控制,要么被一些宗教思想洗脑,甘于成为主流社会的附属品和牺牲品。

人类的贪婪本性导致国与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发动战争,相互残杀使人类背负沉重的负罪感;工业化和自动化使机器取代劳动者,失去实现自身价值机会的劳动者被以高科技为代表的社会主流所抛弃。人类在苦苦挣扎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在混沌中找寻出路。

《五号屠场》是关于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在重大事件考验面前不断成长的后现代小说。毕利经历过二战期间惨烈的德累斯顿大轰炸,目睹过残垣断壁、尸横遍野的人间炼狱。经历过战争的毕利对生死有着非同常人的理解,开始平静地对待生死,甚至能够淡然地接受自己的死亡。毕利被绑架到外星球,外星人对时空、战争和生死等概念的理解完全迥异于地球人,被彻底洗脑的毕利回到地球后,像传福音书般向人类同胞传达外星人的生死观、时空观和战争观(陈世丹 司若武 2011: 131)。毕利人生中的种种经历使他不断地获得再成长的机会,小说经常介绍毕利从541号大众星上学到的东西。战争经历使他再成长,他对生死具有新的体验和理解“……当一个人死去时,他只是貌似死去,因为他在过去的时光中还是充满生命力的”(Vonnegut 1968: 26)。与外星人的交流使他再成长,对诸如战争等现实问题具有新的认识。在与外星人的交谈中,毕利想知道外星人对残忍的地球人以及和平问题的看法,为地球人如何避免战争而寻求良方。毕利问道:“地球人是整个宇宙中可怕的人,如果其它星球现在没有,那么它们将很快受到来自地球的危险。所以请告诉我能够拯救我们大家的秘密,以便我回去时带回去:一个星球如何生活在和平之中”(同上: 116)。外星人认为毕利的问题很愚蠢,因为“地球与宇宙毁灭没有任何关系,只可惜地球也一起被摧毁……在为我们的飞碟试验一种新燃料时我们把宇宙炸毁了,541号大众星上的一名试飞员按下按钮,然后整个宇宙消失”(同上: 117)。“作为一个时间旅行者,毕利多次看到自己的死亡,并用录音机描述自己的死亡。”(同上: 141)毕利1945年已被告知自己将来死亡的时间,此后常以平静的心态谈及自己的死亡:“我,毕利·皮尔格利姆,将要,已经,而且总是将要在1976年2月13日死去”(Vonnegut 1968: 141)。毕利之所以能够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原因是他接受外星人的生死观和时间观:“当特拉玛法多人看见一个人的遗体时,他认为这个死去的人只是在那个特定时刻处在糟糕的状态,但在许多其它时刻这个人还是很好的。所以我在听说某人死亡的时候,只是耸耸肩膀,然后像特拉玛法多人那样说一句‘就那么回事儿’而已”(同上: 27)。外星人传达给毕利的生死观、时间

观和战争观彻底颠覆地球人相关的传统观念:线型的时间一去不复返,生和死属于两个无法逾越的世界,爱好和平的人类要尽力阻止战争的爆发,等等。在经历过德累斯顿大轰炸、德国纳粹集中营关押、战后乘坐的飞机失事和妻子死于车祸等意外事件之后,毕利完全接受“前世注定”(predestination)的观念,得出人类根本没有实践自由意志(free will)的机会。这两个观念是对人类一直宣扬的人类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观点的彻底反驳。经过这次外星之旅,毕利大脑中代表着地球人固有的传统观念被彻底颠覆,特拉玛法多人的思想帮助他重建全新的时间观、生死观和战争观,帮助他建立起一套新的认识世界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再成长。

《打闹剧或曰不再孤独》则是一本从儿童到少年、从成年到成年之后不断向成人世界进行反叛、颠覆和抗争,修订并重建新的人生信条、标准和原则的过程和感受的作品,是一部关于主人公人生感悟的小说“这是一部关于人生对我意味着什么的小说”(Vonnegut 1976: 1)。作者在小说开始就似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提前交待给读者:“在讨论人生时不提及爱,我感觉很自然。爱对我来说似乎不重要了。什么似乎是重要的呢?诚心诚意地与命运讨价还价”(同上: 2)。小说主人公与孪生妹妹出生时先天畸形:“我们是怪物,预计活不长。我们每只小手有6个指头,每只小脚有6个脚趾,我们还有多余的乳头——每个乳房上有两个……我们在婴儿期就长有成年人宽厚的眉脊,倾斜的额头和蒸汽铲一样的下巴”(同上: 28)。两个人把头挨在一起时具有超强的智力,一旦分开便像两个弱智儿童一样。感到耻辱的父母把兄妹俩安置(实际上是遗弃)到远离人群和亲情的另一个世界中,一幢已废弃30年的幽灵般的老宅,孤零零地坐落在山顶,深处于面积达两百英亩的苹果树林中。房子四周是上面有铁刺的铁丝网围栏,使两个需要亲情的孩子觉得被埋进坟墓一般。两个孩子对成人世界的反叛开始于父母对他们冷漠和鄙视的态度“我们的父母为我们感到恶心,每年到我们这个小行星进行一次太空航行时说话都结结巴巴的”(同上: 59)。在即将过15岁生日时,两个孩子得知父母希望他们抓紧些早点儿死。本以为在父母面前把自己超常的智力水平展现出来会让他们开心,也许他们全家人会开始新的生活。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父亲感到内疚,因为他让别人把自己聪明的孩子当成傻瓜对待如此长时间”(同上: 74)。而母亲也会发现:“在像伊莱扎和我(《打闹剧或曰不再孤独》中的两兄妹。笔者注)这样怪物般的身体中的智力和敏感只能使我们更加令人厌恶”(同上: 75)。连每天负责探视兄妹俩的莫特博士对他们从低智力的怪物到高智商的“蜕变”(同上: 77)也反映平淡。两人最后决定“回到痴呆的状态,一切就会好起来”(同上: 78)。显然,成人世界的虚荣和虚伪彻底击碎两

个孩子善良、纯真的心,打破他们对于幸福家庭的向往。他们渴望得到的父爱、母爱被剥夺,自身的智力水平和丑陋的外表被大人们有意掩盖。拥有美丽、聪慧孩子的期待被打碎之后,父母心中固有的理想世界和价值体系被颠覆,他们无法去爱像怪物一样的孩子;父母的关爱缺失,孩子们对父爱和母爱的渴望破灭,内心深处对爱的向往和对美好的家庭幸福的追求被挫败。无奈之下,在为生存而战的挣扎和反抗成人世界的压制中,两个孩子建立起自己的两人世界(a nation of two),具有自己认知世界和价值体系。经过一系列测试,被证明有读、写能力的哥哥威尔伯被与妹妹分开,送往科德角一所为“极度烦躁”孩子开办的学校。虽不是天才,但由于威尔伯“智力在中等以上,有耐心,品行良好……是这个学校历史上第一个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而且成绩优异被哈佛大学录取”(同上:111)。没有读、写能力的妹妹伊莱扎被强行与兄长分开,被关在一个为低能人设立的机构,她认为自己受到不公待遇,多年后聘请律师状告该机构和亲属,要求立即被释放,并重新获得被无辜扣押的遗产。威尔伯后来结婚生子,但他对妻子和儿子没有任何的爱,认为儿子“像长在藤上的南瓜,除了水分多之外没啥特点,只是一直在长大”(同上:142)。从来没体会到父爱或母爱的威尔伯自然不会去爱别人,他续写着爱的缺失的故事,反抗以父母为代表的虚伪的成人世界;妹妹伊莱扎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以更加成熟的方式面对并挑战成人世界的压制。反抗和挑战成为兄妹俩进入成年之后再成长的主要标志,作家以他们的故事警醒人类: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父母在兄妹俩儿身上播下的仇恨的种子无法结出爱的果实;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和小说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样,一方的仇视只能换来相互的敌对和战争。

四

通过以上4部小说中主人公成年后的“再成长”经历,冯内古特揭示出高科技和战争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危害,抨击成人世界,尤其是当权者对大众命运的漠视。物极必反,科学和技术如果取代原本为人带来实现自身

价值的手艺和技能,人一定会仇恨代表高科技的精英阶层,颠覆以机器为代表的自动化统治;除身体上的伤害外,战争给人带来的心灵创伤无法治愈,人类只能设法以行动补偿自己的罪恶,从宗教信仰上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成人世界的无理和专制始于家庭,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爱的伴随,带着仇恨进入成人世界只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伤害。未成年人进入成年时有很多无知与无畏,成年人的“再成长”则增加更多的无奈与无助。

参考文献

- 陈世丹 司若武. 论冯内古特的元小说文本[J]. 外语学刊, 2011(4).
- 丁坤敏 郭红. 科学启示录——《猫的摇篮》对科技理性的批判与反思[J]. 外语学刊, 2016(3).
- 郭红. 《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中人的向善本性与战争创伤[J]. 外语学刊, 2015(1).
- 芮滢萍 刘春慧. 成长小说:一种解读美国文学的新起点[J]. 宁波大学学报, 2015(1).
- 徐文培. 冯内古特科幻小说现实主义小说文本的开放性[J]. 外语学刊, 2012(6).
- 徐文培. 冯内古特小说中戏拟手法的运用研究[J]. 外语学刊, 2014(6).
- Allen, W. R. *Conversations with Kurt Vonnegut* [M].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8.
- Twain, M.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M].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1.
- Vonnegut, K. *Slaughterhouse-Five* [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8.
- Vonnegut, K. *Slapstick* [M].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76.
- Vonnegut, K. *Player Piano* [M].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1980.
- Vonnegut, K. *God Bless You, Mr. Rosewater* [M]. New York: The Dial Press, 2006.

定稿日期:2016-06-01

【责任编辑 孙颖】